



智库之宝

张仲礼

王冷一等◎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智库之宝

张仲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库之宝：张仲礼/王泠一，钱铮，李莹编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45-278-2

I. 智… II. ①王…②钱…③李… III. 张仲礼—传记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1635 号

智库之宝：张仲礼

编 著：王泠一 钱 铮 李 莹

责任编辑：杨 国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

插 页：4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78-2/K·046

定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香润师德如兰*

蒋学模

张仲礼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我与他相识多年,虽然交往不多,但通过直接接触和间接的信息渠道,对他的学术成就、为人处世和领导作风,还是有所知的。他大学毕业后,曾长期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958年他响应祖国号召,辞去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职,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经济史、上海民族资本、近代上海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等发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中国和美国的学术奖励,最近,还在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获得了第一次设立的学术贡献奖。

他在1984年到1998年长达15年的期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作风民主,待人谦和,深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同志们的爱戴。他在1983年到2002年长达20年的时间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从事国务活动,每次参加人代会,都深思熟虑,提出议案,而且往往是第一号议案。由于张仲礼同志的上述品质,所以,虽然我与他不在同一单位,我却始终把他看成是我敬爱的领导。这是我由衷之言。

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同志筹备成立“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成绩突出的青年学者,我对这件事非常赞成,认为是符合党中央要求重视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的。

* 这是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2005年参加“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暨上海社会科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时所作的贺词。经蒋先生生前同意,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序。

大家知道，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理论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理论人才培养相对滞后……”这份文件分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文件大家都看到了，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想就同“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关联比较密切的经济学科的情况谈一点看法。

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怎样？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包括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于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意见是很不一致的。

例如，我国的经济改革，既包括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又包括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如何把两种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经济学界就有不同的看法。

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在全国产业结构中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总的说，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但怎么进，怎么退？意见就很不一致。有一种主张，认为国有经济应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这种主张对不对？

国有企业的改革核心是产权改革。有一种主张，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应该走“经营者持股”、然后是“经营者持大股东”、然后是“管理层收购”这样的路子。对这种主张，现在经济学界争论很大，应该怎么看？

上面只是举例，实际上改革开放中问题很多，意见很不一致。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要吸收，如果吸收，如何一分为二地对待西方经济学？

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说明，经济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如何坚持正确的方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那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对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进行奖励，是很有必要的。张仲礼学术奖励的面不能太宽，但奖励少数人，鼓励了多数人，意义是很大的。

序二 学海无涯的治学精神

王荣华

张仲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泰斗,半个世纪前他的著作《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就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张仲老的学术生涯有几个重要阶段:1947—1958年在美期间,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职位,并出版英文版《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得到当时美国远东研究学界的高度评价,也为开始着力从事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为主时代的中国江南地区社会发展研究填补了空白。

1958—1966年,受新中国感召,于1958年辞去美国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投身刚刚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此后50年一直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荣辱与共。最初,他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并积极进行上海工业史料的抢救工作。当时的经济所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出版了多部为后人广泛享用和赞赏的资料图书,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

1978—1991年,张仲老的学术生涯进入收获阶段,完成了从工业史料编撰到企业研究的转移,主要成果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与汪熙联合主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与陈曾年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主编);《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与陈曾年、姚欣荣合著)。期间,任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

1992—2002年，张仲老利用自己在美欧的影响，积极展开多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赢得国际声誉。期间，主要学术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著作，完成了从企业研究向城市研究的转移，同时将上海史的研究整合为上海学的研究，并推向国际汉学界。期间，主持了多项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作出了智力贡献。

2002年至今，张仲老深刻认识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战略意义，多次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生态文明见解的文章，完成了城市研究向生态研究的转移。同时，他还分别担任了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名誉主编的职务。

张仲老的研究创意、组织能力和丰硕成果让我和同志们深感钦佩，但我更觉得他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相传的宝贵财富。张仲老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即使如此，他还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乐于倾听晚辈们的意见，以宽阔的胸襟和严谨的态度处理各项工作。

二是学风严谨，勤于治学。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张仲老的学术地位有目共睹，但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继续着学术研究，同时关心着学术界的现状。他对于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学风正派，令人钦佩。

三是联系实际，关注社会。张仲老是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案61项，并且相继有8个提案被列为当年的“一号提案”。他特别重视理论对实际的指导，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身体力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着不懈的努力。

四是巨人之肩，激励后学。张仲老极为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甘为人梯，给晚辈的成长以无私的帮助。这种高尚的品格，也正

鼓舞和感动着每一位晚辈,成为我们继往开来的动力。

多年来,张仲老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设立一个专门的学术奖励基金,以此来奖励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2004年,张仲老因“19世纪中国社会绅士阶层的原创性研究及学术成果的国际声誉”荣获首届上海市学术贡献奖。他将奖金奉献出来作为奖励基金。经过全院同志半年多的准备和共同捐资,2005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如今,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已经颁发了四届,为科研队伍发现了一批人才。张仲老充分体现了一代学人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他的高尚品格和远见卓识。

本书让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张仲老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他是我们道德的楷模,他的风范更鼓舞着我们以院为家,爱院即爱家。在全院同志正在投身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发扬张仲老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也只有这样,上海社会科学院才能尽快达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新境界。

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
委书记、院长)

序一 香润师德如兰	蒋学模 / 001
序二 学海无涯的治学精神	王荣华 / 003

报 国 篇

跃进岁月：挑一担书上北京	/ 003
“五七干校”的觉悟：没有稿费也照样能够很好地工作	/ 009
浦东初奠基：来自汪道涵的任务	/ 016
世博会的缘起：超越上海的梦想	/ 025
学术之桥：中美交流的文化使者	/ 035
奖学金的设立：化作春泥更护花	/ 041
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	/ 050
《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的名誉主编	/ 060
张仲礼与格致中学	/ 066
峥嵘岁月的“一号议案者”	/ 074

学 术 篇

张仲礼和《中国绅士》	/ 087
用 GDP 思维观察的《中国绅士的收入》	/ 098
融入集体的力量：《荣家企业史料》的诞生	/ 113

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列强洋行在旧中国	/ 130
近现代城市史的领军研究：从上海到沿江、沿海再到长三角	/ 146

风 范 篇

邓伟志：他是我的老师，一位爱国、细致、严谨、低调的老师	/ 167
陈 绛：学长有坐冷板凳的习惯	/ 172
左学金：与老领导更多的是心灵上的交往	/ 177
熊月之：在名和利的关系上，他对自己很淡薄	/ 184
刘 华：他可以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宝，也是一位现代儒者	/ 191
沈国明：四两拨千斤的院长，热爱学术和国家的榜样	/ 194
沈祖炜：对后辈的关心有口皆碑	/ 199
宋一雷：老院长是普及社会科学的领路人	/ 203
李轶海：他从来都没有坐过公务舱	/ 206
权 衡：他就像很厚的一本书，永远都读不完	/ 210
萧兆铭：喜欢吃红烧肉的和善老人	/ 213
宋 慧：大师的社区凡事	/ 217

附录：

张仲礼学术思想座谈会纪要/王泠一整理	/ 223
张仲礼先生的学术成就/张忠民	/ 245
张仲礼先生回忆录/张仲礼口述 施扣柱整理	/ 258
张仲礼：半个世纪的报国情/田晓玲	/ 280
2000年以后张仲礼发表的媒体文章精选/王泠一选编	/ 287

跋 请勿歌仰止 雄峰正相迎/谷超豪	/ 301
-------------------	-------

报 国 篇



跃进岁月：挑一担书上北京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革命者和先贤们的不二选择，张仲礼离开上海后不久，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点亮了东方古国的黎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是否会走苏联式的道路，在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也引发了探讨。张仲礼在到达美国后不久，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当时，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正在高涨，他和他的导师都主动要求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理解当时特有的社会氛围。华盛顿大学的学习环境还是很自由宽敞的，所以老师总是鼓励多读书、读不同意识形态的经典著作。当时年轻的张仲礼还经常去参加美国各地的学术会议，现在他还记得西海岸经济学会曾在西雅图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时的经济学家各抒己见，学术氛围也相当自由。根据这个会议的内容，张仲礼整理成报告，在吴大琨的帮助下于1948年发表。

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恰好是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开始。美国出现了极端的右翼反共思潮——麦卡锡主义，包括卓别林在内的很多进步文化人士都受到排挤和攻击。但张仲礼后来回忆说，当时麦卡锡主义没有起到长时期的作用，只猖獗了一两年，持续时间并不长。不过在其猖獗的阶段，学者们都还是很紧张，做事情都很小心。因为当时有很多无畏的进步教授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但都被麦卡锡抓住进行猛烈“批斗”，后来，也没有一所大学敢请麦卡锡本人来校演讲。终于，麦卡锡越发走向极端，也导致了公众对他的反感，到1958年张仲礼回国的时候，麦卡锡本人在参议院的地位已经下降。

在张仲礼回国之前，钱学森被横加阻挠，很多资料都被没收，自己的笔记都被没收，但是他还是坚持回国。张仲礼利用美国对人文学者放行比较松的时候，准备回国。但是美国移民局、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经济研究所的同行都不希

望他回国,甚至还多加阻拦。事实上,他从1956年开始和家里通信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学成回国的愿望,但直到1958年才成行。回国前几天,美国移民局还把他们的夫妇分开询问,只要有一个人不是自愿回国的,他们就不会放行。所以,当时回国意志极其坚定的张仲礼,只能带着自己的头脑回到阔别了11年的祖国,而他在美国办公室里一桌子手写的卡片都不敢带回。“为此回国以后,译者要翻译我的书,找资料也是很辛苦的。先在上海地方找,然后去南京,最后去北京,找到的资料还是不够。只能利用在美国求学、治学的一些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在美国找到了一些原始资料。”张仲礼在回国50年后曾经这样告诉本书作者之一的李莹。

而张仲礼回国之后,组织安排他到刚刚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具体在经济研究所从事企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这是一份被称之为“坐冷板凳”的工作,张仲礼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里,除了接受所谓的“改造”,张仲礼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资料整理和企业调研,几乎不参加什么争论。他也不放什么“学术卫星”,“文化大革命”前的8年只动笔写了几篇论文。

所谓“学术卫星”,是指1958年和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全国各条战线都刮起了虚报成绩的浮夸风,而科教战线也同样热衷于制造的科研神话。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论年龄大小和文化程度高低,都普遍进入了一种狂热状态。当时有一首反映农村大跃进的民歌,叫《我来了》,就是那种狂热情绪的典型表现。这首受到过毛泽东引用的民歌有这样的语句: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农村狂热,关于粮食等各类农产品亩产量的神话不断被刷新。在城市,文化界和知识界也狂热。1958年的中国作协就曾经这样发出感慨: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会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狂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鼓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梦想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实现在我们眼前呢!为此,中国作协还要求各地大胆提出创作指标,如上海分会就号称两年内要创作各类文学作品4000部、创作歌词3000首。当然,我们后人眼中的狂热,当时叫做“豪迈”。

知识界也极为豪迈。张仲礼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必须豪迈,张的老同事、老朋友陈绛曾经这样回忆:这时全国热气腾腾,各行各业都卷入了“大跃进”的高潮中。上海经济和历史两个研究所在1958年已从中国科学

院剥离出来,和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原来经济所研究人员大多归入经济史组。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有人在全院跃进大会上发出豪言壮语:“我们要用扁担挑一担书上北京!”《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幸成为这所谓“一担书”中重要的一本,于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加紧排印500本,在国庆前夕作为内部讨论稿出版,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因为采用深红色做封面,我们后来一直称它为“红皮书”。

陈绛后来的回忆是:在此前后,我有时应约为《解放日报》“新论”副刊等写一些配合形势的应景文章。1958年9月21日,上海市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七一公社成立。我参加了所里组织的七一公社调查。为了宣传“十年赶超英国”,新从中央宣传部调来的副所长庞季云组织农业组陶家祥和我一起写文章,三篇文章编写成一本小册子《伟大的十年·辉煌的成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反映了自己当时头脑发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状况。张仲礼那个时候,也许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氛围,依然按自己的研究轨迹运行。他只是在1960年第9期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1834—1867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与背景》。不过,这篇论文也有鲜明的时代痕迹,主基调是为太平天国时期的贸易政策歌功颂德的。

荒唐的“大跃进”之后,便是来自自然的惩罚,全国陷入了工农业生产萎缩和食品严重短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城市和农村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在内地如河南等省出现饥民潮的时候,在上海的张仲礼感到生活总体上还算宽裕。当时为了对付经济困难,各大单位还强调自力更生。如拥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食品供应也到了很困难的时候。好在当时革命者出身的院领导们都有人定胜天的南泥湾精神,毅然决定在原圣约翰大学校址、现华东政法大学总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内空地以及郊外养猪,所以张仲礼回忆当时经常会分到猪肉。每到过年过节,知识分子的配给也会相应增加。当时还有一个优惠政策是:无论是否抽烟,每个月都会配给高档、中档(大前门)的香烟。当时张仲礼自己不抽烟,但是他父亲抽烟,所以每次前去看望他老人家时候,会经常带一些给父亲。当时张仲礼抚养四个孩子,即使物资少,只要有能力购买生活物资,他就会想尽办法去买。自然灾害的时候,如果在外面吃饭,他会同对方交涉,常常要花费很久时间才可以勉强带回一些吃的东西。

当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感受因生活压力而略有不同。如从空军部队转业到历史研究所担任秘书工作的徐鼎新,其爱人是护士,他们在1962年6月喜得公子,而这之前他还有个6岁的女儿。孩子们的成长自然没有什么忧虑,

但徐鼎新在他的自传中却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的儿子出生以后，与姐姐一起住在外公外婆家。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十分匮乏，居民生活也比较困难，我们两个孩子寄放在外公外婆家里，每月就要补贴一些生活费；而这时我父亲与继母在一起单独居住，在生活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因此我们两人每月工资的 $\frac{2}{3}$ 要用于补贴双方父母，其余 $\frac{1}{3}$ 用于日常开支，总感到入不敷出，不得不在各自单位里借助互助金以应不时之需。所以一到年关，孩子们欢天喜地迎接新年，而我们则常常愁肠百结。一年当中节衣缩食仅有的几十元储蓄便全部用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夫妻两人上要赡养双方父母，下要抚育两个子女，是非常辛苦的^①。

而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名义退休，如今又以自由撰稿人自居的吴中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他的回忆，几乎可以作为我国计量与短缺经济学的重要史料。他在之前的大跃进时期，也被迫参加了“学术卫星”的炮制工程，为此还要经常加班到深夜。最初，“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到食堂免费就餐”。但好景不长，“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令吴中杰难以忘怀的是：“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以买饭，亦可以买菜，只要有钱，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了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斤，中户每月1斤半，小户每月1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增加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

^① 《徐鼎新自传》第65页。

交。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这些票券，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①

从张仲礼的感觉和吴中杰的回忆来看，上海物资供应的短缺状况还不是最严重的。事实上，1960年9月，中共中央被迫向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削减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在城市，除了高温、高空、井下等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城市人口则每人每月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吴中杰每月口粮指标的降低，显然是这一指示下的产物。在严重的物资短缺面前，为了保证文教机构和科研院所的基本运转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国务院在那个时期还是给予了最大可能的照顾。根据当时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起草的一份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副食品供应的建议报告，我们看到了当代人无法理解的具体标准：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4斤、白糖2斤、鸡蛋3斤、甲级烟2条；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则每人每月供应肉2斤、白糖2斤、鸡蛋2斤、甲级烟2条。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这个标准，要低于延安时期每人每月的相关伙食补贴水准。延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初步打破平均主义式分配的第一个阶段。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之后，延安的生活供应条件有了相应的物资保证。根据朱鸿召对延安时期日常生活水平的研究，当时的物资供应分大灶、中灶和小灶。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当年各灶的标准是：大灶，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中灶，每人每天须有3两肉吃；小灶，副食品水准和中灶相当，但主食强调供应大米。1944年，副食品供应增加了油的概念，如规定大灶每人每月15两（当时1斤=16两），小灶每人每月1斤半。而中国共产党优待高级知识分子和外国专家的传统，也是起源于延安时期。从现有记录来看，除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婉言谢绝每月100元津贴的好意外，高级知识分子和外国专家对于党和政府给予的优待是欣然接受的。如毕业于柏林大学医学院、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和马德里保卫战的印尼华侨毕道文，1940年1月经宋庆龄介绍到延安，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的职务。毕道文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诗人艾青则经周恩来介绍，于1941年初由重庆到达延安。他作为知名文化人，享受的是中灶待遇：每月3斤肉，一半

^① 《复旦往事》第99页。